

媒介二十五讲

李彬 王君超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媒介二十五讲

李彬 王君超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媒介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生活在媒介所传达的信息海洋里,媒介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是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相关联的?

全书以二十五篇演讲的录音为蓝本,围绕大众媒介这一核心话题展开讨论,从各自的角度反映了本领域内具前沿性的观点,体现了国内有关媒介话题的活跃思维和热烈讨论。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本书防伪标签采用清华大学核研院专有核径迹膜防伪技术,用户可通过在图案表面涂抹清水,图案消失,水干后图案复现;或将表面膜揭下,放在白纸上用彩笔涂抹,图案在白纸上再现的方法识别真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二十五讲/李彬,王君超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0

ISBN 7-302-09678-3

I. 媒… II. ①李… ②王… III. 传播媒介—文集 IV. G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3530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客户服 务:** 010-62776969

责任编辑: 纪海虹

封面设计: 傅瑞学

印 刷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 三河市兴旺装订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73×235 **印 张:** 20.5 **字 数:** 40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9678-3/G · 524

印 数: 1~4000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以及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2770175-3103 或 (010)62795704

立足主流 融会中西^①

范敬宜

筹划已久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今天终于宣告成立了。大家从四面八方和天南海北聚集到秀丽的清华园，参加这个盛会。首先我谨代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全体师生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位老友新朋表示由衷的欢迎与诚挚的谢意！

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站在新世纪的开端，回首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走过的艰难曲折道路，我真是感慨万千。1903年，在上海租界出版的一份名为《苏报》的报纸，由于大力宣扬反清爱国的革命思想，遭到清政府和租界当局的追查与迫害，最后《苏报》被封，两位主要当事人——激励了一代仁人志士的《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和清末民初的革命家章太炎被投入监狱，后来邹容死于狱中，年仅20岁。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和新闻史上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这个事件恰似一个标志，既浓缩了百年中国的风雨如磐，又折射了当年报业的举步维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千百万人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如今的中国不仅社会面貌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巨变，而且我们的新闻与传播事业也获得了明显的长足发展，不仅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通讯社以及互联网等传播媒体日益构成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新闻与传播事业在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更是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对此，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当然会感到自豪与欣慰！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深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特别是面对新世纪的风云变幻和经济全球化的波涌浪翻，如何卓有成效地发展新闻与传播事业，如何使之成为国家长治久安、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幸福安康的一大“利器”，这些课题都十分现实又十分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面前。正是为了应对诸如此类的挑战，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新闻与传播事业，清华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在已经具有一定影响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上组建了新闻与传播学院。

这所诞生于春天的学院，同样充满了生机、活力与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办学思想、

① 此文为作者2002年4月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致辞。

办学模式与办学精神上将要形成一系列自己的特色。今天借此机会，我想简单谈谈其中的一些关键内容。

我们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依托清华大学多学科的深厚背景，在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平台上构筑新的学科框架和学科体系。众所周知，随着新闻与传播活动的日趋活跃，随着新闻与传播事业的日趋发达以及它所涉及的方面和领域的日趋庞杂，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综合性趋势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为此，我们将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坚持和发扬一切优秀传统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整个学科的整合，从而开创新的综合性学科体系，开拓新的研究型办学模式，开辟新的开放式教育局面。

我们将立足主流的意识，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重要领域开展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大力加强基础学科、基础理论与基础研究，重视学术的规范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努力提升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针对新闻与传播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积极开展战略性和对策性的研究。不管是基础性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我们都将瞄准世界一流目标，按照高起点、高水准、高质量的精神锐意进取，在占领学术前沿之际，争取多出精益求精的原创性成果，其中尤以新闻、影视、新媒体及媒介经营等领域为主攻方向，在与国内外学术界广泛交流与多方合作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将始终遵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思想，积极推进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里，我们固然需要吸取世界各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宝贵经验，特别是继承我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我们更需要通过教育思想的解放、课程体系的创新、教学内容的调整、培养方式的改革等，探索一套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对新闻与传播人才需求的培养模式，为新闻与传播行业造就一批以硕士研究生为主的高级人才。他们既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又具有广博的文化基础和娴熟的专业技能；既具有开放的世界眼光和通达的人类情怀，又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批判意识；既具有高尚的精神情操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又具有百折不挠的拼搏意志和承担重任的精力和体力。

我们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并发扬“行胜于言”的校风，与国内外主流媒体展开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互动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大量吸取新闻与传播实践里的新鲜养分，并将其有机地融入教学与科研之中，又希望尽可能把新思想、新思路、新成果引入新闻与传播实践，为我国新闻与传播事业及其现代化提供各种有益的参考、咨询及培训，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能够成为决策部门、实际部门和教学科研部门进行良性沟通的一座桥梁。

我们将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于各个方面，特别在人才培养方面注重综合素质，强调严谨为人、诚信为学、务实求真、追求完美的精神。大家知道，梁启超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他与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和赵元任

先生共同建立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并开创了“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范式，他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早已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时，梁启超先生还是我国新闻事业的杰出先驱，他那些精彩纷呈的新闻实践与精义迭出的新闻思想，是我国新闻传播学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他那“笔端常带感情”的文体，至今仍是新闻工作者的学习典范。毫无疑问，我们将继承这些得天独厚的遗产，并努力将其发扬光大。

这里，需要特别表明一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还非常年轻，许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提高，另外我们也深知各方对我们寄予殷殷厚望。所以，我们全院师生自当脚踏实地，齐心奋斗，不辱使命，不负众望。与此同时正如俗话所说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希望得到海内外影响卓著的新闻媒体和兄弟院校的支持。

杜甫在他的诗里说过“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我正是以古稀之年出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这使我既感到不胜光荣，又感到几分忐忑，同时倍感责任重大，深恐有负重托。许多朋友都知道，我五十年的新闻生涯是在坎坷和曲折中度过的，因此我特别珍惜今天时代给予我的机遇、赋予我的责任。二十年前，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是我命运发生转机的时刻，我写过一首述怀的诗，最后两句是：“自怜去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华年二十去如飞，我没有想到即将偃旗息鼓的时候，又面临一个新的“战场”、一场新的挑战。此时此刻，似乎什么话都难以表达我的万般心曲，想来想去，惟有用先祖范仲淹的名句来激励自己以及全院师生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谢谢大家！

2002年4月21日

目 录

立足主流 融会中西 范敬宜 (Ⅲ)

上 编

第一讲 开场白	李彬 (3)
第二讲 人文精神与大众传媒	尹鸿 (13)
第三讲 媒介形态与社会变迁 (大纲)	熊澄宇 (29)
第四讲 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	李彬 (33)
第五讲 文化传播学及其影响	史安斌 (42)
第六讲 审视媒介语言的社会文化内涵	范红 (49)
第七讲 传媒发展的深层动因	刘建明 (70)
第八讲 中国电视产业的现状分析和发展趋势	陆地 (81)
第九讲 媒体人员的社会责任	范敬宜 (90)
第十讲 开拓传播的空间与维度	陈玲 (100)
第十一讲 解读媒介的负面影响	王君超 (114)
第十二讲 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传媒	胡显章 (134)
第十三讲 新闻的平衡与真相	李希光 (149)
第十四讲 漫谈“后非典时代”新闻发布与媒体公关:技巧与 案例	董关鹏 (156)
第十五讲 媒介变迁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演进	李彬 (172)
第十六讲 最后一课	李彬 (201)

下 编

第十七讲 日本的新闻学与新闻事业	卓南生 (213)
第十八讲 中国电视产业政策的若干问题	陆地 (224)
第十九讲 如何得出科学结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	金兼斌 (232)

媒介二十五讲

第二十讲 与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刘建明 (247)
第二十一讲 媒介的生态环境	崔保国 (259)
第二十二讲 媒介文化纵横谈	史安斌 (267)
第二十三讲 媒介批评话题	王君超 (277)
第二十四讲 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的培养	尹鸿 (287)
第二十五讲 “战地玫瑰”话新闻	闾丘露薇 (306)
编后记	(317)

上 编

第一讲 开场白

李 彬

今天是《媒介与社会研究》的第一堂课，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生应该做什么，二是怎么做。这两点同托尔斯泰最关心的问题相似：“对于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样生活？”

做 什 么

过去一周，同学们参加了一系列入学教育活动，听了各种各样的谆谆教导和耳提面命。比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比如面向主流、培育高手等。再加上最近的一番闹哄哄的选课，大家现在脑子里恐怕快成一锅粥了，或者说快成叔本华说的各种思想的跑马场了。

为此，我想试着为大家捋一捋庞杂的思绪，帮助大家再明确一下自己的努力方向与目标。因为，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航船要驶向哪个港口，无论什么方向的风都会让你觉得是逆风。

那么，航船应该驶向哪里？研究生的方向与目标到底是什么？再具体点说，我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应该做什么？

这个问题大概困惑着许多同学，其他细节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比如，有的同学曾问我，研究生应该偏重学术，还是应该偏重实践？另一方面，有的同学或许已经抱有明确的目的，比如来读研究生一是为了水木清华的令誉，二是将来可以找个好工作（什么是好工作？）。再如，以清华新闻传播为跳板，纵身奔向美丽的新世界（笑）。这些同学似乎已经端正航向，好像已经明了自己的航船该驶向哪个港口了。然而，急功近利就是研究生的唯一目的吗？由此前行真的就一帆风顺吗？是否需要再认真考虑一下其他方面的可能呢？

所以，我请大家还是都好好想一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到底应该做什么？这里，我谈谈个人的看法，供你们参考。

钻 研

大家知道，清华大学现在正在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对此，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不过，无论如何人言言殊，有两点相信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底线。第一，一流大学得出一流的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比如学有所成的硕士或博士，而我们学院的定位就是以硕士研究生为毕业生的主要出口。第二，一流大学得有一

流的学术研究和一流的学术思想。这两点缺一不可,特别是第二点尤为关键。因为没有一流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就不可能造就一流的人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所以被公认为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首先就在于这里有国内一流的学术思想(当然并非所有的学科都是如此)。另外,只有一流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而没有一流的人才,那就不是高等学府而是高等研究院了,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以,一流大学至少得有一流的学术思想和一流的人才。

那么,一流的人才与一流的学术思想从哪里来呢?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表明,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一条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里所说的“陡峭山路”,那就是钻研、钻研、再钻研。如果有谁说,除了这条陡峭的山路,他还知道别的什么路能够通达顶峰,那么可以断定,此人定是个学术骗子。比如,要想真正学好一门外语,以达到读通原著甚至原典,而不仅仅只是达到日常交流的水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下功夫,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如果有谁告诉你学通外语有这个窍门那个窍门,而就是不用下功夫,不用刻苦钻研,那么此人肯定是个江湖骗子。

所以,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在铸就一流人才和一流学术思想的历程上,从来没有什么旁门左道,从来不能投机取巧,只有钻研、钻研、再钻研。换言之,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就在于钻研,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例外都是研究型大学。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大学不是因为有大楼而是因为有大师,而大师不就是“研究型”这个核心的集中体现吗?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除了大师,大学还得有名副其实的大学生,就是以求学问道为第一要务的大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相长、相互切磋、探讨学术、钻研学问,这是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品格。这个品格既适用于理工科,也同样适用于文科,既适用于基础文科(如文史哲),也同样适用于应用文科(如新闻传播学、经济管理学、法学等),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读万卷书

对我们学院的研究生来说,研究型这个核心可以分为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概括地说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一方面,研究生一定得认真读书,不读书谈什么研究呢。毋庸讳言,现在有些研究生不怎么读书,尤其不怎么读经典原著,诚可谓“刘项原来不读书”。对这种情况,我比较反感,因为天下有多少一心想来清华读书而来了的人啊,而你有这样的机会却不用功。当然,不读书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有些家境贫寒的同学,如今不得不为生计奔忙,而顾不上读书钻研。也就是说,不是他不想的问题,而是他不能或无法全力以赴的问题。对此情况,自当别论。

日前,有位面临毕业的研究生同我谈起他的一些困惑。听说他现在兼着两份媒体工作,可想而知他能有多少时间来读书钻研。现在眼看快毕业了,他感到有点惶恐,觉得自己没有多少长进,进来的时候什么样,现在好像还是什么样,问我该怎么办。其实,我也

不知道该怎么办。生米都快做成熟饭了，还能怎么办呢，只能让后来的同学引以为鉴吧（笑）。不过，当时我还是谈了一些想法。

我说，新闻传播是影响社会、左右历史的一大利器，新闻传播工作者说到底是社会工作者，所以必须对社会历史有深切洞明的认识、体察与把握。新华社记者的基本功不是写报道，而是搞调查研究。这道理很简单，你不了解社会历史，怎么可能准确反映它的变化、发展及本质呢？又怎么可能深刻影响它的进程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与透彻的把握。同样，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也正在于毛主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入考察与深刻理解。毛主席早年的一篇代表作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力著，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对我们学院的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了解社会历史更是当务之急，或者用当下一句俗不可耐的话说叫“重中之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由我们学院的宗旨决定的。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面向主流，培育高手。什么是主流，什么是高手？主流就是决定国计民生的东西，高手就是承担社会重任、堪称民族脊梁的人物。你们想想，这样的重任，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没有一种博大的胸襟、高远的见识、深刻的思想呢？怎么可能不深刻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脉搏呢？

说到了解社会历史，至少需要具有三种素养。第一是最基本、最基础的知识素养，比如历史知识、地理知识、经济学知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风土民情等。特别是历史知识更像是一个大平台，人类所有的问题都得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考量，你只有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搭起这样一个平台，才能使学到的一切知识各就各位。这就好比手头有了一张北京地图，才能清楚清华大学在哪里，她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的方位与距离等。所以马克思说，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学。

了解社会历史所需的第二种素养，就是在这个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所谓理论，无非是对世界的一种系统化表述。没有理论，当你面对纷至沓来、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与问题时，就会一头雾水，找不着北。有人可能轻视理论，觉得我将来是搞新闻实践的，我就爱扛机器、拍片子、写稿子，理论不理论和我没什么关系。其实，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我们每个人做每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奉某种理论。没有理论的实践，那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经济学家凯恩斯说得好，那些鄙视理论的人，不过是被另一种过时的理论所左右。

我们这里说的理论主要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我知道，现在年轻人说起新潮理论可能一套一套的，而一听到马克思主义就有点不以为然了，似乎那已是过时的老皇历。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如此，对马克思主义总是不屑一顾，而对各种时髦理论则趋之若鹜，惟恐掉队，这就跟年轻人喜欢赶时髦的心态一样。而如今，我越来越觉

得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这种伟大不仅体现在对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的通透认识上，而且也体现在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上。其实，许多新潮理论家往往都秉承马克思主义的衣钵，都是马克思的徒子徒孙。比如，那位当红的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德里达就说过，我们都是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我们无不感受着马克思“幽灵”的纠缠，就像哈姆雷特时刻受到先王“幽灵”的纠缠一样。再以现在红得发紫的福柯为例，他那著名的话语理论听起来似乎玄而又玄，其实说白了就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话语实践上的具体展开，就像那句大白话说的：“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懂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你对当下中国五花八门的各种理论、观点与思想自然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了。

总之，理论学习对大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平时说某个人肤浅，无非是指他缺乏理论素养，而一个缺乏理论素养的肤浅之人，怎么可能成为主流的高手呢？

除了知识素养与理论素养以外，还有一种素养就是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与洞察。现在，某些自以为是的小愤青常以不读《人民日报》、不看《新闻联播》为荣，其实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最关注的恰恰是《人民日报》与《新闻联播》的一举一动，而不是某些另类媒体。研究新闻传播，更是需要密切关注这些方面的信息与动态。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治意识，所有新闻传播的大家高手，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不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识，无不具有政治家的眼光与素养。当然，仅仅关注各种现实的信息与动态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现实世界进行感同身受的调查研究。这就说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

对新闻传播学来说，我们的一切学习与研究都决不能仅仅限于书斋，仅仅满足于象牙塔式的钻研，而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因为新闻传播学是一门以实践性为其宗旨与导向的学科，离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新闻传播学就失去了生命，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学习新闻传播学一定得把社会实践摆在突出的位置上，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理论的学习。

不过，这里需要专门补充一点，我们说的实践性是一个哲学的范畴，具有丰富的内涵。有些同学往往将实践性等同于实用性，甚至是操作性。一说实践就只想着扛机器、拍片子、写报道，其实这是对社会实践的简单化或庸俗化。实践首先是一种态度与取向，是对现实世界与社会人生的专注与投入。有了这种态度与取向，即使你呆在家里钻研理论，同样可以说是一种实践。谁能说马克思在不列颠图书馆撰写《资本论》的时候，不是在进行一种革命实践与社会实践呢？他的一个著名论断颇能说明这一点：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理论），而在于改变世界（实践）。同样的道理，我们学院不少老师研究的课题，都对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影响。当然，为了更透彻地了解实际、更真切地把握实际，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深入新闻传播的第一线，应该而且必须掌握起码的

专业操作,比如撰写新闻、编排版面、配发评论、制作节目等。

另外,我们说的实践性更主要的还是指对国情民情的认识,这种认识可以概括为这样三层内容。一是我们怎样从过去走来——这是历史,二是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这是现实,三是我们应该向何处去——这是未来。这三个方面所包含的经世济民与经世致用的学问足够大家研究一辈子。比如,大家可以利用假期,找个老少边穷的地方做点社会调查,看看那里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感受一下他们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听听他们的心声与希望。对你们这些未来的主流高手来说,了解国情民情这一课一定得补,现在不补,将来也得补。否则,你就算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你即使满腹经纶,一腔热血,张口全球化,闭口国际化,左一个新名词,右一个新理论,外语说得比汉语溜,电脑用得比人脑灵,可就是同中国的实际格格不入,最后还怨天怨地,怨别人素质低,“月亮不懂你的心”。当年的王明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的人,现在的某些“海龟”也是这样的人。这种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呢?不在于他们没有理论、没有学问,相反他们的理论大了去了,他们的学问也高了去了,他们的症结不在这里,而在于不了解国情民情,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不了解大多数人民的生存状态。

以上我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做了简单的梳理,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钻研,即研究型大学以研究为核心。两个基本点一是读万卷书,二是行万里路,即掌握理论和了解实际。

怎 么 做

明确了“做什么”的问题,接下来就该是“怎么做”的问题。也就是说,应该怎么去钻研,怎么去学习理论、把握实际。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没有一定之规,所以只能提点儿原则性的意见。根据我的经验,不管什么方向的研究生大概都要面对和处理这样五个关系。

新闻学与传播学

这两个领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新闻学与传播学确有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在于新闻学本质上属于人文学科,而传播学本质上属于社会学科,所以新闻学的精髓是一种人文关怀,而传播学的精髓是一种学术关怀。另一方面,新闻学与传播学又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截然分开,其中最明显的联系就是两者都得关注大众传播媒介,都得同媒介打交道。比如,新闻学可能研究电视新闻,这在我们学院又属于影视传播的领域;同样,影视传播可能研究“凤凰卫视”的新闻节目,这又同新闻学相关。再如,新闻学研究可能涉及新闻传播的体制与制度问题,而这也是媒介经济所关注的问题;同样,媒介经济的研究又不可能不涉及新闻方面的内容。

总之，新闻学与传播学并非截然分开、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大家别把两者看得泾渭分明，以免限制了自己的研究视野。

理论、历史与方法

不管是新闻研究还是传播研究，都由三大基础板块所支撑。一是理论，比如新闻理论或传播理论；二是历史，比如新闻传播史或媒介发展史；三是方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是相通的，所谓“传播学研究方法”同样也适用于新闻学。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根据以往的情况，学生对专业理论的学习一般来说比较重视，而对历史与方法则有所轻视。他们以为，只要有了深厚的专业理论就可以应付一切了，至于历史与方法则似乎可有可无。比如，有人可能觉得，历史是过去的死东西，而自己只对活生生的现实感兴趣，所以可以不关心历史。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如不及早纠正将会制约你在研究中的长足进展。

理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历史与方法同样须臾不可或缺。首先，历史与现实是个有机的整体，永远不可能截然分开。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实，现实的一切无不从历史中生成，不了解历史，怎么可能真正了解现实呢？所谓只关心现实而不关心历史，就像只看收获而不看耕耘，那是根本不可能看明白的。事实上，任何学科的任何高水平研究，无不具有相当的历史内涵与背景。拿后冷战时代最流行的理论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例，它就是从近代以来的各种折冲樽俎的历史进程中推导出来的。再以英美新闻传播学的经典理论——“报刊的四种理论”为例，它同样是从近代各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所以，不管新闻研究还是传播研究，千万不能忽略历史背景。

关注历史的另外一层意义还在于，任何研究都必须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只有清楚前人都做过哪些研究、取得哪些进展、还有哪些问题，你才能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才能推陈出新。牛顿说，他之所以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他比前人聪明多少，而是因为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果一个从事科学的研究的人对前人的研究一无所知，其结果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忙活半天、沾沾自喜，突然发现人家早就研究过了，而且研究得更深更透，原来自己瞎忙活了一阵，做了个无用功。我的一个研究生因为写论文看了一些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闻学期刊，她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告诉我，原来现在一些炒得沸沸扬扬的东西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已被探讨过了，而且比现在谈得还好。看来前人并不弱智，倒是自己往往显得弱智。所以，在科学研究上应该是“不薄今人爱古人”啊（笑）。

关于方法的重要性，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可以说，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整体水平还不高的原因，不在于是否有思想、是否有材料、是否有创新，而在于科学方法的欠缺。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是，有了米就可以做成饭吗？不行，因为还得有工具，还得有锅碗瓢勺。不然的话，你就是特级厨师，就是有泰国香米，也照样做不出

饭来。研究工作也是如此,没有米即没有真才实学是不行的,但光有真才实学而没有工具同样不行,这个工具就是研究方法,特别是现代的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不管是新闻学研究还是传播学研究,都应该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我们学院前些年有的研究生论文水平不高的原因,就有历史与方法欠缺,当然也存在理论方面的不足问题。由于理论、历史与方法的欠缺,这些论文往往只能就事论事地做点表面文章,称不上什么研究,更称不上高水平的研究。

继承与创新

这个关系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纵向的问题即历史的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横向的问题是指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一般来说,谈及这个问题时我们常说“洋为中用”,也就是说在继承西学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中国自己的学术思想,比如传播学的本土化。而实际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学术思想整体上一直处于“中为洋用”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思想日益失去自己的根基,而成为西学的附庸。对此,有识之士早有论列。比如,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出于自己的需要,望文生义或曲解其意地将陈先生的这一思想解释为一种流俗的东西。但我觉得,陈先生的“独立”、“自由”虽然包含西方一些近代观念,但其核心恰恰在于标举中国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他是不忍看到中国的学术思想全都沦为西学的传声筒,不忍看到中华文明成为西洋文明的翻版。由于具有这样清醒的意识,老清华的文科形成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风格,涌现了一大批像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等大师名师,铸就了煌煌上庠的清华文科。

再如,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反对党八股,力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其实也体现着一种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追求。他在《反对党八股》里就明确写道,党八股也是一种洋八股。他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主席还以其非凡的实践为这种中国作风与气派树立了样板。比如,我们常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随着综合国力的强大,中国学人的独立意识更是空前萌动,自立自强越来越成为当代学人的共识。新一期《读书》杂志的头题,刊发了甘阳论华人大学的谈话。这篇谈话高屋建瓴,条分缕析,值得大家研读与思考,其中心思想之一就是:“希望看到今后的年轻代‘中国学者’,不是唯唯诺诺只会跟着西方走的人,而是对西方思想学术和制度都能形成自己批判看法的中国独立思考者。”其中特别提到19世纪美国学者爱默生的那篇著名文章——《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这篇文章堪称美国学者标举学术独立、摆脱对欧洲依附关系的“独立宣言”,美国的学术思想由此开始走向独立与繁荣。爱默生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大声疾呼: